



国家高端智库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RUC Perspectives

思想评论

赵鼎新：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政党和政党发展

2016年第6期 (总第9期)

【阅读提示】本期选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的新作《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政党和政党发展》。本文根据赵鼎新教授 2016 年 10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讲演实录整理而成。

关于政党的基本概念与源流，赵鼎新教授强调指出，政党的产生是一种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政治现象，“拉党结派古来有之，政党政治却是现代现象”。确切地说，现代政党是英美政治的产物，因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均出自这两个国家。而相比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赵鼎新教授认为，18 世纪末成立的美国民主共和党更加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此外，赵鼎新教授还总结了现代政党产生的三大原初条件，即弱国家和自由主义传统、世俗意识形态以及选举范围的扩大等社会现实需求。

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出发，赵鼎新教授总结归纳了世界政党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即自由和保守思潮主导下的政党（18-19 世纪中叶）、阶级和民主思潮主导下的政党（19-20 世纪中叶）、冷战下的政党及其危机（20 世纪 50-80 年代）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政党（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在上述社会历史进程中，赵鼎新教授指出，由于所处阶段和具体国情的不同，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总体呈现出一种“东西双轨”的演变态势，这一点在进入 20 世纪后的东西方世界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此外，赵鼎新教授还重点结合“冷战”与民主化的“第三波”这两大历史阶段，对东西方政党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及其演变进行了详尽阐述。谈到世界政党发展的总体趋势，赵鼎新教授指出，“第三波”民主化退潮后，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高涨并逐渐向宗教

和同步高涨的原教旨主义靠拢。再加上左派的持续性分裂，上述诸多因素共同造就了世界政党发展的两大新趋势：一是民族主义政党、族群党和宗教政党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张；二是左派政党继续衰落并且在认同感政治的主导下大量演化为“单议题政党”。

未来，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的发展仍将面临一系列不确定性。对于中国而言，务必要在充分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继续在战略和战术两个层面保持足够的定力，少犯政策性错误，力避政治性错误。惟其如此，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历史洪流中站稳脚跟，不断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终极目标稳步前行。

历史社会学视野下的政党和政党发展

赵鼎新*

坦率地讲，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政党对我而言绝对算得上一个全新的课题。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谈一谈我对政党问题的态度与观点。为了能够对政党有更加系统深入的理解，我用了一段相对完整的时间查阅、梳理资料并大致确立起了自己有关这一问题的模型与思路。在此，我很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这些我认为有别于既有政党研究成果的新模式、新思路。

一、拉帮结派古来有之，政党政治却是现代现象

（一）为什么古代社会产生不了政党？

要想从历史社会学层面搞清楚政党，我们就必须首先弄明白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世界上的政党从产生到现在都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二是政党在将来会如何发展，这些无疑都是最为核心的问题。同时，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始终试图用我的经验和头脑去演绎政党。最终，在阅读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后，我合上这些书本，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拉帮结派从来就有，政党政治却是现代现象？古今中外，不论在何种社会之中，拉帮结派这一政治现象并不罕见。例如在中国古代，宋朝和汉朝都有大规模的所谓“党争”，明朝也有著名

*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国家“千人计划”入选学者。本文根据赵鼎新教授 2016 年 10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的讲演实录整理而成。

的东林党、阉党等政治派系。但是，为什么它们最终都没有促成政党的产生，我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在传统社会中，政治派系的生存和光大都严重依赖君主的偏好。也就是说，君主一旦不喜欢某个政治派系，那么它便无法生存下去。但是，君主的偏好往往是不稳定的，出于防范心理，君主也不喜欢任何派系持续坐大。哪怕说某个派系是支持君主的，君主也会对其不放心，更不必说那些失去了君主偏爱的派系。因此，传统社会中的政治派系一般都很难实现制度化。因为在我看来，政党之所以被称之为政党，首先必须是一个制度化的派系。当然，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说制度化的派系就是政党的话，那么宋朝时期的派系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制度化了。我们知道，宋朝自建立起就存在着党争现象，而且随后持续长达一两百年，直至宋朝灭亡时为止。

第二，传统社会缺少政党存在所必须的一项核心要件——意识形态。对于任何政治派系而言，如果其背后没有相应的意识形态来支撑的话，那么它就只能停留在拉党营私这一层面，而在传统社会之中，这一罪名绝对是什么政治派系都难以承受的。实际上，古代的传统社会也具有类似于近现代意识形态的一种替代物——宗教，只是它在东西方各有不同的具体承载物而已。对于古代中国而言，这一“宗教”体现为儒学。在其他社会，它可能是基督教、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等等。在那个时候，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宗教，它具有主宰一切的强大力量。而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宗教在特定的背景下的确也会出现某些变化，但最多也只是出现了一些有关宗教的新的解读。这种解读在中国被称为新儒学，而在西方，情况则要相对复杂得多。例如，

在当时的欧洲，针对基督教的各式各样的新解读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明朝时期来到中国传教的以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意大利耶稣会。对于这些传教士而言，他们只是在宗教里从事不同的职业以及对上帝的解读略有不同。而从制度化的层面上看，他们并没有超越同一派系的范畴。总之，在传统宗教势力主宰地位不变的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派系几乎不可能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二）现代政党是英美政治的产物

于是，沿着历史社会学的脉络，我很自然地将我关注的焦点转向了世界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三个大国——英美法。首先，从政党的角度来看，我不认为世界上最早的、严格意义上的政党产生于法国。自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政治始终在专制与自由之间摇摆，政治秩序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期间所产生的吉伦特、雅各宾等政治势力充其量只能算作派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政党。

由此，我又进一步将关注点转向了英国。相比法国，英国在世界近代进程的诸多方面均可谓独占鳌头。具体到政党层面，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国王的力量就逐渐受到议会和法律的约束，这一点无疑为政治派系的制度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快，两个最具代表性的派系在英国产生了：一个是辉格党（Whig），另一个是托利党（Tory），前者强调议会的权力也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权利，后者强调保皇。到了 19 世纪中叶，辉格党加上托利党的一部分又组成了英国的自由党，其余派系则继承了保守的旗号，直至 1833 年保守党成立。后来，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又出现了新的意识形态，这不仅促成了工党的诞生，而且也使得英国政党政治生态发生新

的变化。

对于现代政党而言，美国的政党史同样至关重要。1790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创立了民主共和党。从更加现代性的角度上看，该党无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党。对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而言，政党已经演化为一个更具专业性的派别，其内部往往集中了几十甚至上百位政治精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进一步搞活民主的话，仅仅靠极少数精英去完成扩张组织、拉选票等庞杂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这种政党扩张的现实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政党规模和数量的持续扩大。在这一过程中，另一个重量级政党——美国共和党于1854年正式成立。

(三) 现代政党发展的三个原初条件

沿着上述分析逻辑，我认为，现代政党的产生和发展还必须具备若干原初条件。也就是说，当我上文中假设的政党产生的条件是正确的话，那么它要继续发展的话，背后就必须至少拥有以下三个条件作为支撑：

首先，弱国家和自由主义传统。弱国家给政治精英提供了结成派别乃至控制政府的欲望，因为国家一旦过于强势，精英们便很难有机会达成目标。而在自由的文化和制度环境下，派系斗争的格局不再是你死我活，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派系的稳定化、制度化以至逐渐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提供了土壤。

其次，世俗意识形态。它在西方最早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当然那个时候并不十分成型，如霍布斯的有关思想。但到了16、17世纪尤其是17世纪，自由主义慢慢成型了，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荷兰的斯宾

诺莎（Baruch de Spinoza）以及英国的约翰·洛克（John Locke）等。由此，自由主义便成为了近代史上第一个成型的世俗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政党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所谓的“世俗教会”（secular church）。

第三，选举范围的扩大等社会现实需求。从组织动力学的角度来看，选举范围的扩大是现代政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一般而言，小范围的选举只需在少数人之间就能够实现并维持。同时，党员规模、党费、党产、党纪、党员动员机制、党员忠诚等因素在小范围选举的情况下也几乎没有必要过多地顾虑。但是，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选举范围的扩大，政党发展的组织学动力愈发强烈。当时，随着政党的吸纳对象逐渐从中产阶级扩展到白领工人乃至全体白人，政党的动员机制也一直在不断拓展并深化。

（四）世界政党发展规律小结

以上便是我对世界政党发展演化历程所做的一个大致梳理。在具体梳理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一套逻辑来展开假设、推理与演绎的。同时，我也在时刻关注着相关领域的西方理论。不过坦率地讲，我认为西方学界有关政党的各种解释性理论大都未能切中要害。当然，其中也并非完全没有真知灼见。例如，在解释政党的产生与发展方面，美国学者利普塞特（Seymour Lipset）和罗肯（Stein Rokkan）在其 1967 年合编的一部著作（*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 Free Press, 1967）中就创造性地提出了所谓“社会裂痕”理论，即政党的发展演变必定是某种社会现实的反映。依据这一理论，利普塞特等认为，欧洲政党政治的现实

正是当时社会矛盾的真实反映，它也折射出了世界政党体系中的四种裂痕——教会势力和国家间的矛盾（church vs. state）、雇佣者和被雇佣者间的矛盾（employer vs. employee）、次文化和主流文化间的矛盾（subject vs. dominant culture）以及主流经济和从属经济间的矛盾（second vs. primary economy）。从上述社会裂痕理论出发，我们似乎可以认定，一国政党政治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社会裂痕形态存在一定的关联。但是，这一点却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社会裂痕如何去定义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导性社会思潮和政党建构间互动的结果，两者间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那样简单。

综上，根据我的梳理和总结，我认为我得出了历史上英美乃至世界范围内政党政治发展的某种规律，它至少包含以下两点：一是英美政党组织在政治过程中显示的有效性是政党政治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的一个原始动力；二是自由主义思想和势力的大小、当时的流行性意识形态以及具体的社会需求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背后的三种决定性力量。

二、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

有了上文的相关铺垫，我们便可以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对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进行相应的阶段划分。在此，我的划分标准主要是根据当时社会流行的主流意识形态而定。当然，我也会考虑到它们各自相应的历史后果。大体而言，我认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历史阶段：

（一）自由和保守思潮主导下的政党（18-19 世纪中叶）

在该阶段，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主要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

者之间的斗争也可以视作中产阶级与国家间的斗争。其中，自由是重要的思想武器，核心问题是保皇（王）还是追求国会的权力，前者代表皇帝（国王），后者代表资产阶级。有代表性的焦点问题主要包括保皇（王）还是自由、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等。由于该部分在上文中已进行过阐释，在此不再过多涉及。以下我将重点围绕后三个阶段展开相应论述。

（二）阶级和民主思潮主导下的政党（19-20 世纪中叶）

当人类历史发展到 19 世纪中叶之后，我们会明显地看到，意识形态越来越多了，如无政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甚至有些令人应接不暇。但是，这其中却始终有两个最主流的意识形态不断地主导着社会政治的发展进程，它们便是阶级和民主。首先看阶级，它本是属于唯物主义范畴的理论，并且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分别有不同的功能与表现。例如，对于传统社会而言，阶级无处不在，而且对整个社会影响至深。那个时候，不同的人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住的房子也不一样，如果你是平民，那就绝对不可以穿丝绸等高级材质做的衣服。通过这些显而易见的外部特征，我们很容易就会对阶级概念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和认识。而现代社会则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唯心主义的影响，是一种十分依赖自我感觉的认同感（identity）社会。

然而，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人们的总体观念却没能及时跟进，甚至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滞后性。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在 18、19 世纪尤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后，传统阶级社会的痕迹依旧十分显著，当时的许多精英甚至包括一些非常伟大的思想家，都难以完全懂得现代化的意义。因此，他们大都还会带着传统

的、浓厚的阶级观念来理解当时出现的新兴群体——工人。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工人这个群体的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也日渐增多，以至于在很多欧洲城市如米兰、巴黎等地，五十万乃至一百万人口规模的大城市都已经不再罕见，其中工人无疑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在这里，大家的生活方式都差不多，于是工人这个群体很容易就会被精英们用一些老的观点加以理解，例如不加区分地把他们都贴上阶级的标签。在这种传统的思想氛围中，全社会几乎都把这些现象归于阶级范畴。

但是，这种不自觉的将错就错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后果，即使得这些人的认同感逐渐产生。再加上当时并没有福利国家的概念，一旦爆发了经济危机也没有所谓的国家调控来作为补救。因此，一场经济危机下来，工人们中的大多数可能就都失业了。从来源和身份上看，这些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工人大都是已经失去土地的农民。对于这些无产者们而言，失去工作是难以想象的巨大灾难。而当时的国家又恰恰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对待这些新生的工人群体，只能动辄加以镇压。工人们一旦遭到镇压，就会有左派文人出来写文章，将他们说成是先进阶级。可以说，早期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一定程度上就是被左派知识分子“塑造”出来的。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国家的极力打压。

后来，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二战结束后，福利国家体制在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得以确立。这时，阶级标签才开始在工人群体中逐渐失去吸引力。一方面，工人内部对阶级的认同感不断减弱，你称呼他们阶级他们甚至会不以为然；另一方面，对于有钱的工人而言，他们的工资

与蓝领等低收入群体相比相差悬殊，有的甚至会相差几十倍。这时，低收入群体想要搞革命，高收入群体自然会漠不关心。更有甚者，工人内部之间，如男性工人与女性工人、高薪工人与低薪工人等，他们在认同感上的差别和相互间的矛盾甚至要比工人群体和非工人群体间的差异和矛盾还要大出许多。可以说，工人阶级内部如果差异很大，同时却和其他一些群体差异较小，那么这时工人内部的上述两类人实际上就已经不能算作同一个群体了。

与此同时，阶级的发展也带动了 19 世纪各类阶级性政党的产生。伴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到了 19 世纪中后期，欧洲各主要国家几乎都出现了工党，各式各样的工人组织也多如牛毛。例如，以成立时间序，德法俄英四国分别出现了社会民主党（1874）、社会主义工人联盟（1879）、社会民主工党（1889）和工党（1892）等带有工人阶级色彩的政党。

与欧美国家不同，对于当时的东方国家而言，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无疑才是第一要务。例如，当时的中国正遭受列强的共同欺凌，印度也已经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然而，很奇怪的一点是，这些国家明明首先面临着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问题，却也“与时俱进”地搞起了阶级政治，即使它们国内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人甚至缺乏典型意义上工人阶级。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精英们对本土意识形态的发展缺乏足够的自信，于是就只能到西方理论那里寻求帮助，当时的西方流行哪些理论，他们就会将相应的理论大家的思想引进到各自国内并展开对比、探讨。无论是马克思、达尔文还是斯宾塞的思想，只要他们觉得可以，就会拿来用。并且他们还固执己见地认为，一旦用

得好了，其对本国本民族的积极作用必然会十分显著，甚至有可能使自身的国家在后发的劣势中实现“弯道超车”。本着这一动机，当时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始去搞阶级和民主，并将它们视为解决本国民族危机的途径。如果将历史的光谱扩展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话，我们便会很容易在这些国家中找到阶级性、民族性政党的影子：在中国，分别出现了国民党最早的前身——兴中会（1894）以及后来的中国共产党（1921）；在印度，分别出现了国大党（1885）和印度共产党（1925）；在埃及，则分别出现了华夫托党（1918）和埃及共产党（1922）。

具体到当时的西方主要国家，自由民主体制虽已初具形态，但始终难以实现真正的稳定。尽管如此，自由、民主的基本框架还是为西方国家早期的阶级和民主发展提供了成长空间和组织模板。同时也应看到，自由、民主也是分化阶级政党的武器。针对当时的阶级斗争，西方国家采取的措施基本上是两条路：要么镇压，要么妥协。镇压就是采取直接的暴力手段，妥协则要复杂一些，其中最典型的一种做法就是用选票去交换。后来，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逐渐发现，最好的办法还是用选票去实现妥协，即给工人阶级以选票。因为一旦给了工人们选票，工人阶级内部马上就会出现阶级分化，进而内部矛盾就会激化，原来相对简单的阶级斗争形势也会随之变得复杂多样。了解了这一历史渊源，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今天西方社会的阶级阶层分化会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任何社会运动都几乎同时伴有相应的反运动出现。

总之，阶级和民主这两大意识形态在当时的东西方世界各有不同

的地位与功能。在西方，阶级政治主导社会，自由、民主框架为这些国家的阶级政治和政党民主化提供了发展空间。到了 19 世纪末期，已经有不少西方国家搞起了自由和民主，尽管这一体制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英国是如此，美国也不例外。而在东方或其他非西方国家，以“十月革命”为分水岭，阶级和民主作为解决民族危机乃至实现弯道超车的替代性工具，也正在这些国家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在此，鉴于“十月革命”及其对世界政党发展的深远意义，我将重点就俄国的特殊性及其影响予以特别阐述。对于当时的世界而言，“十月革命”的爆发无疑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也是世界历史实践性的真实写照。由此，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所谓的“东西方”之别。俄国作为一个特例，其相应的历史后果最为重大。那么，俄国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俄国作为西方的一部分，具备不容忽视的西方社会底蕴。因此，在西欧社会的发展如火如荼之时，俄国并没有落后太多。它不仅加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而且也同时出现了阶级和民主这两大西方主流意识形态。

第二，俄国的专制背景使得左派政党的生存变得异常艰难。通常而言，一个社会越专制，其内部的政党就越难以生存，被镇压下去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俄国的“落后”也给左派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俄国并没有足够数量的工人，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没有那么多工人，又该怎么去领导？当然，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依然诞生了。但是，俄国的工人阶级政党在诞生的同时也几乎与生俱来地带

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有着极其严明甚至苛刻的组织纪律，如镇压叛徒、保守秘密、少数服从多数、地方服从中央等。这一点和俄国浓厚的专制主义传统是息息相关的，即国家越专制，在此环境中建立起的政党就越需要严苛的组织纪律，否则将很难维持组织的生存。因此，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精英主义和前现代色彩。

第三，俄国存在着大量的少数族裔，并且民族主义已经在他们中间广泛地渗透和扩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俄国具有一定的双重性，它既是个前现代帝国，又是一个与西方传统有所融合的现代帝国。历史上，在蒙古帝国衰落后，世界的东方出现了三大主要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大清帝国。其中，俄国的扩张性最强，疆域也最为广大。伴随领土扩张的进程，俄国逐渐将包括高加索在内的周边地区的少数族裔纳入其庞大的帝国体系。在吸收少数族裔方面，俄国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传统的精英联盟方式，即联合域内各族群中的少数精英实现共同治理，这一点十分类似于清帝国入主中原后采取的满蒙合作统治策略。其中，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与投入运作便是这种合作方式的鲜明例证。在这一方式下，只要笼络得好，这些少数族裔的精英们就不会有民族独立的观念，并且乐于成为整个帝国的统治阶层，乃至心甘情愿地去镇压本民族的分裂言行；二是现代意义上的“俄罗斯化”的通行教育，即在各民族间实行统一的教化策略，从而使得少数族裔从根本上远离独立观念，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出生于格鲁吉亚的斯大林等少数族裔精英。通过长年的教化、引导，到斯大林等人这一代时，他们对俄罗斯民族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认同感。对于这些

少数族裔精英阶级而言，对俄罗斯民族强烈的认同感成了俄帝国旗帜下的一个超越式的替代形象。为了验证我的这一观点，我特意找到了一组数据作为佐证。如表 1 所示，俄罗斯人在俄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为 44%，在布尔什维克中占 42%，两者大体相当。南高加索人在俄国人中仅占 2%，但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却占到 10%，犹太人在俄国人中只占 4%，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占比却达到了惊人的 15%。由此可见，在团结少数族裔精英以增强政党统治力方面，布尔什维克具有其他类型政党所不具有的鲜明特色。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的比重 (%)	在俄国人中的比重 (%)
俄罗斯人	42	44
犹太人	15	4
南高加索人	10	2
乌克兰人	9	19
立陶宛人	6	1
波兰人	3	6
德国人	2	1
其他	13	—

表 1：俄国各族群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和全体俄国人中的比重分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成功团结少数族裔精英方面，斯大林所提出的独具特色的民族理论至关重要。所谓斯大林民族理论，即民族就是具有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基础和心理素质这四个带有显著唯物主义特征的人们组成的共同体。后来，该民族理论在俄国（苏联）境

内得到了广泛推广与落实，并随着苏联影响力的外溢而传播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后发国家。从今天的事实来看，应用这种理论的后果是怎​​样的呢？客观地讲，当我们拿着这四个特征去现实中“套”的时候，便会出现许多不切实际之处。仅以中国为例，运用上述民族理论，许多本应归入藏族的人群被割裂出来形成各自新的民族，而居住在新疆不同地区的、本属于不同民族的各群体却被强行统一为一个民族——维吾尔族。总而言之，俄国在政党领域的思想与实践对俄国自身乃至整个世界政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

（三）冷战下的政党及其危机（20 世纪 50-80 年代）

以上是我从历史社会学角度归纳出的世界政党发展的两条基本路径。可以说，在二战爆发之前，究竟哪条发展道路好？全世界并不完全清楚。举例来说，如果你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话，当被问及哪个主义好这样的问题时，我想相当多的人会选择法西斯主义。这是因为从经济社会层面上看，至少当时的法西斯国家较为有效地带领其国内民众走出了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大萧条，并且极大地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当时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尝试过学习法西斯模式，只是有的国家学不了而已，比如美国，但美国在当时确实已经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的苗头。“冷战”爆发后，东西方世界被迅速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东方出现了共产主义阵营，以华沙条约组织为代表；西方出现了所谓自由主义阵营，以北约组织为代表。如前所述，在世界政党发展的第二阶段，出现了东方和西方两大主要分支。相应地，到了第三阶段，世界政党的发展开始以东西方两大阵营间的对立为主要特征。然而，在众多的不同中有一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沿着东西方

各自道路前行的各国政党政治在这一时期都爆发了一定的危机。其中，西方社会的政党危机表现为持续性的内部分化，其最终的结果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后才能彻底显现出来。相比而言，东方政党危机最大的一个结果就是苏联的最终解体。

具体而言，在冷战时期，西方政党的发展究竟出现了哪些危机？如前所述，在经历了二战洗礼后的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一度备受推崇。再加上冷战中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西方社会愈发重视对民主的打造与包装工作。于是，当我们乍一了解西方民主之时，尤其是在看到欧美各国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收入持续增长等方面的“欣欣向荣”之后，很多人往往就会想当然地得出“西方民主成功了”等粗浅结论。然而，当你对西方历史尤其是西方的民主史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之后，你会豁然发现，西方民主并非完美无缺，更非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金科玉律，而仅仅是在特定前提、逻辑和方法下的一种迷惑性更强的意识形态工具罢了。

西方民主所谓的“成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观点其实就是一句话：在周而复始的“杀人”进程中不断谋得发展。一方面，在二战之前，西方人口的减少主要就是靠对外移民。二战期间，西方各国人口又因战争而大幅减少，当然这些减少的人口中大多是穷人。因此，这些西方国家的社会总资本不仅没有降低多少，国内的阶级矛盾反而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增长，战后欧美各国大都建立起了福利国家体制，这种做法也大大缓解了本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在这一体制下，原有的政党逐渐开始去意识形态化，变得不像政党的样子。多党民主的一些原则逐渐成为共识，阶级和民族意识形

态也变得不再重要。由此，政党和一些传统组织如左派的工会和右派的教会之间的关系不断出现松动，而它们与公司和利益集团等组织的关系却在走向紧密化。此外，党员人数在持续下降，党纪也不再那么重要，选举和执政成了大多数党派的核心任务。在意识形态方面，极左的共产党、极右的法西斯党以及宗教党都倾向于走“中间路线”。

此外，西方社会出现政党危机还有一个重要的诱因，那就是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实际上，自冷战格局形成以来，西方国家的许多共产党、社会党等左派力量，在各自国内一直都具有相当强大的势力。尤其在西欧，左派势力的强盛更是有目共睹。对于这些西方国家的左派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然对苏联这个国家并不十分认可，但依旧从大方向上肯定苏联发展模式的正确性。然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经问世，立刻把西方的这些左派们打晕了。以此为分水岭，左派在西方国家的分裂一发而不可收拾。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左派势力开始走向大分裂，形形色色的左派组织纷纷出现，由它们所领导的反歧视黑人运动、和平运动、女权运动等社会运动迅速席卷了整个西方世界。当然，时至今日，少部分西方左派至仍拒绝承认当年左派的分裂与失败。例如，在欧美的很多大学校园中，左派传统和左派势力仍然十分强大。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极少数左派们不愿意承认现实而已。放眼当今的西方社会，面对宗教势力的恢复和右派政党的卷土重来，继续坚守所谓多样性、空谈政治正确的这部分左派人士不过是在继续做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罢了。

与西方相比，东方文明下的革命政党也出现了危机。概言之，我

将造成这种危机的根源从逻辑上归结为三组不易克服的难题：一是意识形态准则的“热”和执政需要的“冷”之间难以两全。用传统的话语来讲，就是如何实现“又红又专”之间的平衡或“红”和“专”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例如，仅仅从经济发展等方面来看，采取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的政策无疑是更有利的。但是，从“红”的角度来讲，这种片面强调效率优先的发展道路很容易会被冠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那样的话，即使取得再高的经济增长都有将国家引上所谓“歧途”的风险。相比而言，在一个左派政党执政的社会中，左的言行总是代表着政治正确，即使这种言行激进甚至荒唐，也至少不会出现所谓“路线错误”。但是，一旦过于强调“左”的东西，社会的发展就存在着被道德绑架的风险。因此，如何在平衡“左”和“右”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二是政党在执政之后所面临的艰难抉择。当一个政党执掌了国家大权之后，各种复杂的问题便会接踵而至。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必须提供这个国家发展所必须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如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建设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治理污染等等。相比于这些几乎不可能全部实现的繁重任务，向社会提供革命的意识形态这种单一公共物品反而变得相对容易了。因此，只要国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做的不好，很快便会招来大量不满以及相应的民众对革命意识形态的不信任。因为革命意识形态和宗教是截然不同的，对宗教而言，谁也不能证明上帝真的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由于未能严格“兑现”承诺而被追究的隐患。革命意识形态则不然，它有其特定的、具体的目标愿景。因此，一旦在执政后的现实中略有落实不到位之处，民众就很有

可能对政党的意识形态产生怀疑甚至不满。

三是权力势必带来目标替代和腐败，进而导致政党的意识形态失去道德制高点。不论在世界上哪个国家，对于执政党而言，从理论上说，每个人在每天加入这个党的时候，他（她）所持有的动机往往都会是不一样的。这种现象在组织学上叫“目标替代”，即发现加入某个政党对自己有利可图之时，人们就会不断地把自己的目标替代到这个组织里去。

总之，在这三组关系中，第一和第二点会导致一个政党的去极端化，第三点则会导致一个政党失去道德制高点，从而为反体制思潮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下的政党（20世纪80年代—）

如前所述，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西方都出现了严重的政党政治危机。但是，西方的危机却没有集中爆发并导致颠覆性的后果。原因何在？主要就在于民主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矛盾。尽管民主并不是万能的，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却能有效地缓解甚至解决阶级和民族矛盾。相比而言，东方国家的危机是一种“刚性”危机，尤其是对苏联而言，它的民族理论，包括民族独立、自决等内容无不隐含着难以控制的风险。最终，在“天真”的戈尔巴乔夫的助推下，苏联这座大厦在短短数年间就轰然倒塌了。

苏联自由化改革使得它放弃了冷战政策，并且放松了对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域内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这些都为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创造了条件。苏联解体后，“第三波”民主化实际上成了美国加速构建“一超”格局的手段。在冷战结束后

的“单极”世界中，美国乐此不疲地对外输出民主。然而，除了加速消耗美国的国力外，这一“民主输出”战略并没有给美国自身以及这个世界带来太多益处。以今天的视角回望“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我们发现，除了捷克、匈牙利等极少数原来具备一定民主传统的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所谓民主转型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且有的国家至今仍未能彻底走出“虚假民主”笼罩下的发展困局。

此外，在增加国内经济负担的同时，美国的民主输出与军事干涉还催生并进一步加剧了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危机。西方社会中下阶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并且在政治正确的干扰下彷徨于包括难民潮在内的各类危机之中。“第三波”民主化退潮后，民族主义情绪在世界范围内普遍高涨并且逐渐向宗教和同步高涨的原教旨主义化靠拢。加上左派的继续分裂，共同造就了世界政党发展的两大新趋势：一是民族主义政党、族群党和宗教政党势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持续扩张；二是左派政党继续衰落并且在认同感政治的主导下大量演化为“单议题政党”。具体而言，在欧洲，以法国“国民阵线”为代表的极右民粹党近年来发展迅猛；在伊斯兰政党方面，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至今已经执政超过十年，印尼四个伊斯兰政党在 2014 年获得了多达 30% 的选票。“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北非分别出现了宗教政党的强势回归现象，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以及摩洛哥的公正和发展党等。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及其相应制度可以为任何“合法”政党包括极端的反自由主义政党提供舞台。但是，它却无法保证在其他政党发展起来之后，自由主义政党和思想不会被

边缘化。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主要是一种制度环境，而纯粹的自由主义政党在一个国家的政党谱系中一般不占优势的主要原因。

同时，自由民主体制对于任何政党乃至整个政党系统而言都有两项重要的去极端化功能：一是自由环境下形成的认同感的多样化趋势，由此导致社会组织相互牵制，利益难以聚集，大规模的革命不容易形成；二是在选举和叛乱之间，政党往往会选择选举，这又导致民主国家不容易产生革命或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当然，这一点也并不是绝对的。当某类社会问题被认为长期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民主自由的去极端化功能不但会降低，而且会很容易沦为极端思潮兴起的保护伞。

此外，自由主义现在出现了三大现代性的社会运动——阶级运动、民族运动和宗教运动。那么，面对自由主义的话它们又有何种表现？具体而言，当阶级运动面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之时，其结果往往是被分化瓦解；当自由主义面对民族运动时，其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可能会“好来好散”，但也并不尽然，不过这种“好来好散”的趋势将会是发展的大方向；而当宗教运动碰上自由民主时，情况就复杂了，因为宗教在自由环境中将极易出现寄生成长现象。当用来处理国内一般的世俗性矛盾时，自由主义往往是非常有效的。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当代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环境均处于剧烈变动时期，这就使得自由主义与宗教运动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纷繁复杂，解决起来也往往会更加困难。

（整理人：赵卫涛、林雪霏）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人大国发院”）是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

国发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为指导，以“四个全面”战略为研究框架，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特色研究领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整合中国人民大学优质智库资源而打造的、独立的非营利实体研究机构。

国发院以“国家战略、全球视野、决策咨询、舆论引导”为目标，对当前中国与世界面临的紧迫性问题进行政策与战略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三大核心研究领域，形成了十大核心研究团队和十大智库产品体系，致力于打造成为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高端智库。

理事会：

理事长：靳诺

理事：陈东升、毛振华、裘国根、刘强东、刘伟、王利明、伊志宏、郑水泉、顾涛、郭海鹰、刘元春

院务会：

院长：刘伟

执行院长：刘元春

副院长：杨光斌、聂辉华、王莉丽、伍聪

电 话：010-62512142
邮 箱：nads-qk@ruc.edu.cn
网 址：http://nads.ruc.edu.cn



研究关乎国家方向的思想问题和话语权，

高端智库责无旁贷。

主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主编：杨光斌 责编：赵卫涛 林雪霏